

Richard M. Nixon

BEYOND
PEACE

超越和平

[美]理查德·M·尼克松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超 越 和 平

〔美〕理查德·M·尼克松 著

BEYOND PEACE

Richard M. Nixon

范建民 郑志国 文 棣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1 号

208/06

Richard M. Nixon

BEYOND PEACE

© Copyright 1995 by World Affairs Press

1994 by Richard M. Nixon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责任编辑：米小平

封面设计：丁 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和平/(美)尼克松(Nixon, R. M.)著;范建民等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ISBN 7-5012-0685-6

I . 超… II . ①尼… ②范… III . ①尼克松, R. M. -政论-
著论②对外政策-国际关系-政论-美国-当代 IV . ①D771.209
②D87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4962 号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05)

京联照排公司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7 字数: 171000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定价: 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一 超越和平后我们面临的挑战	1
二 超越和平后的新世界	21
美国必须领导	23
俄罗斯和自由的胜利	33
美国与欧洲：老朋友的新使命	70
亚洲和新的美国世纪	87
美国和日本：步调一致地走入下一个世纪	89
中国：“他们中的佼佼者”	101
越南、古巴和北朝鲜：关闭抑或敞开大门？	113
架设通向穆斯林世界的新桥梁	118
发展中世界：自由的最后边疆	131
三 超越和平后的美国	143
强有力但职权有限的政府	150
平等的机会，不平等的结局	157
讲求实际的理想主义和远见卓识的现实主义	160
新闻媒介：无节制的自由	162
有关政府的种种神话	165
医疗保健“改革”：使大政府变得更加僵化	175
新的时代，落后的教育	180
福利事业：美国城市的病态	185
美国的犯罪和种族问题	189

大众文化的堕落与毒品.....	194
上帝和家庭：重新发现真正的美国精神.....	199
个人使命，国家使命.....	207
后记.....	216

—

超越和平后我们 面临的挑战



我们在冷战时期所付出的努力阻止了共产主义向西欧扩展，同时也遏制了共产主义在当时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各国的扩张，特别是在阿富汗——苏联红军向之施以武力的唯一一个第三世界国家。里根总统扩展军备的政策往往遭人诋毁，但正是这一政策向苏联的制度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其展开竞争，而最终却未能承受住竞争的重负。这一政策措施，以及从杜鲁门至布什所有冷战时期总统的努力，阻止了苏联共产主义的进一步拓展，从而加速了它的崩溃。我们的行动使千百万人免于经历悲惨的命运和暴政的欺凌。

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应该对我们在冷战中发挥的作用感到骄傲。然而，共产主义的失败是一柄双刃剑。1815年滑铁卢战役结束后，威灵顿看着成堆的尸首——在这次战役中5万人在同一天内倒下去——感叹道，只有一件事“比赢得一场战斗更糟，那就是在战斗中败北”。从历史的角度看，取得军事胜利后总会有一段时间感到疲惫不堪。冷战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的，也是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诸方面的胜利。因此，我们在所有这些领域都同时感到精疲力竭。

在整个冷战时期，我们都期望着有一天我们能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上，国际关系融洽，经济繁荣，尽情地收获不受束缚的全球贸易的果实，自由和人权深入人心，有机会享受生活。这些和平的期望凝聚成一幅冷战后世界的理想图景。理想未能变成现实使人们产生了一种遍布全身的衰弱感觉，犹如演唱时音调突然降了八度。和平的实现仅仅为建设一个更加繁荣、公正的世界打

下了基础。这种努力所需要的决心、远见和耐心丝毫不亚于击败共产主义。

但冷战后我们的失望情绪带来了一种潜在的、破坏性的副产品，即美国人民对于领导世界越来越感到厌倦。他们不再愿意承担领导的角色。1972年我启程赴中国之前不久，曾设晚宴招待安德烈·马尔罗，他当时评论说，美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没有刻意追求却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从本质上讲，我们是孤立主义者，我们卷入海外的斗争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同时也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正在从事一项伟大的理想主义事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放弃了它在和平时期奉行的传统的孤立主义，在全世界展开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在道义上具有深刻意义。现在有许多人认为，该轮到别人来承担起海外领导的重负了，我们应把自己的注意力和资源转向我们的国内问题。这是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提出的主要观点，也是作为外交政策专家的布什总统在1992年大选中败北的主要原因。

许多美国人认为，我们在冷战中的胜利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和平将有助于解决我们的国内问题。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冷战的结束使我们的国内问题更趋恶化了。外来的挑战使我们团结在一起；国内的挑战却使我们四分五裂。我们必须认识到，内外政策犹如暹罗双胎，一方离开另一方便无法生存。除非我们在国内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否则美国人民就不会支持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反过来说，软弱的经济，如我们所知的30年代的状况，几乎必然导致软弱的对外政策；软弱的对外政策，又会造成潜在的、灾难性的后果。欧洲的经济萧条因我们短视的贸易政策而雪上加霜，法西斯分子在那里攫取政权决非意外。漫长的和平时期往往是发展缓慢的时期。没有人会说战争对于一个国家是件好事，但无可否认的是，美国往往是在面对侵略或其他重大国际挑战时才处于最佳状态（在经历了苏联人造卫星升空的震惊之后，我们在空间探

索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就是一个很恰当的例子)。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大多是战争时期的总统。我们生产力的急剧提高和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也都发生在战争时期。在冷战后的时代，我们的敌人既非共产主义，也非纳粹主义，而是自拆台脚的悲观主义，为迎接这一时代的挑战，我们必须对战争时期我们所拥有的活力、乐观主义和共同目标等资源加以引导，使它们在这样一个时代在国内外发挥作用。

夏尔·戴高乐曾经说过：“只有在从事一项伟大事业的情况下，法兰西才可能呈现出她的真实面目。”美国也是如此。伟大的事业把我们——无论是作为国家还是作为个人——推上了顶峰，否则我们便无法达到这样的高度。如果没有伟大的事业来激励美国，当我们努力奋斗去迎接下世纪的挑战时，就连我们国家的统一也会受到威胁。

如果美国想继续作一个伟大的国家，那么，我们今天就需要去完成一项超越和平的使命。

在我担任总统的最初几年里，越南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冷战则是它黑暗的背景。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斗争成了普遍规律；和谐只是个别例外。1970年5月9日破晓之前，我前往林肯纪念堂，当时正值反对卷入越南战争的群众示威活动的高潮，我参观时遇到了一群聚集在那里的示威学生。他们大多是享有特权的年轻人，不必去越南服役。他们告诉我，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错误的。我强调指出，成千上万与他们同龄的年轻人正在越南战斗，正因为如此，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才能永远地免于战争。林肯总统曾经为了国家统一这个抽象的、几乎是精神上的概念，进行了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一场战争。在这位总统的纪念碑的阴影下，我试图让那些学生把眼光放远一些，越过这场战争——他们认为是错误的——给他们带来的困惑和苦恼，认识到这场战争是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和最基本的原则。

回到白宫后，我口授了对这次谈话的回忆：

最重要的精神因素有哪些？我知道当今的年轻人正在寻求答案，正如我在 40 年前也在寻求一样。我只想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是结束战争还是清洁街道、净化空气和水源，都不能满足精神上的饥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饥渴，当然，这是有始以来生命的最大秘密。

许多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示威者向往着更加美好的世界，这种向往找到了一种最直接的表达方式：严厉批评美国的国内外政策。他们追求平等、公正和真理。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有像我这样丰富的人生阅历，因此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品质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是多么缺少，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又是多么富有。他们只知道他们感到愤怒、无望和精神空虚。他们相信，结束越南战争将消除弥漫于全国的不和谐气氛。当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于 3 年后结束时，示威活动也停止了。但和平不足以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冷战结束后的和平也是如此。和平是一个伟大的目标，但它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物质财富也不是万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拥护者相信，只要国家提供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人们的最大愿望就将得到满足，但共产主义创造出来的却是世界上最单调、最没有活力的社会。共产主义的色彩不是红色，而是灰色。60 年代“伟大社会”计划的倡导者们认为，政府可以用其仁慈之手满足穷人的物质需求，以此对他们的精神加以安抚。但美国的大城市今天却充斥着犯罪、嗜毒和失望。生活富裕者一生忙忙碌碌，聚敛巨大的财富，到头来却发现他们并不比原来更快乐，精神上也并不比原来更富有。调查表明，许多事业有成、日益成熟的高峰代人把他们的沃尔沃和宝马轿车又开回了教堂，到教义中去寻找答案，他们的父辈曾因尊崇同样的教义而受到他们的嘲弄。这类事例以及无数其他的事

例表明，个人不可能从纯粹的物质主义中得到满足，无论其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抑或是资本主义。个人与国家一样，都需要比自身更伟大的事业。

朗·富勒在其《法律伦理学》一书中雄辩地论述了责任感与使命感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也适用于个人和国家。战争时期奖励的是责任感、绝对地执行命令以及在不做错事的前提下做正确的事。责任感尽管是不可或缺的东西，但对于和平时代的伟大人民来说，却不是一个恰当的标准。使命感要求我们不仅去做我们被要求去做的事，而且要努力完成我们能够完成的事。既然我们作为自由的人民已经帮助打败了共产主义，履行了自己的责任，那么我们现在就必须去接受更高的挑战。每一个人、每一个社区和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尽力发挥自身的全部潜能。我们必须缔造不仅仅是没有战争的和平。我们必须使和平成为通往更伟大目标的手段。

冷战之初，真正的和平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遥远，杜鲁门总统在一次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强烈呼吁给希腊和土耳其以军事和经济援助，以便使这两个国家能够对付共产主义的威胁。两名新当选的国会议员，约翰·肯尼迪和我，投票赞成援助。从政治角度讲，肯尼迪投出这一票是困难的，因为他的马萨诸塞选区自由的民主党人反对任何军事援助。对我来讲，这也是一个困难的政治选择，因为我的加利福尼亚选区的保守的共和党人反对一切对外援助。我们之所以投赞成票，是因为我们为一项超越了党派政治的伟大事业所激励，那就是打败共产主义。我们的投票有助于两党的携手努力，从而在40年中阻止了苏联对西欧的侵略，并以一项伟大的事业把这个国家团结起来。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当时对战争的威胁作出了极出色的反应。现在，我们难道不能够对和平之后的期望作出适当反应吗？战争焕发出人类最美好和最丑恶的品质。和平应当是只展现那些美

好的品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温斯顿·丘吉尔雄辩地描述了我们今天还在面对着的同样困境：

为什么战争成了把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唯一目标？为什么唯有战争才足以召唤出极其伟大而美好的牺牲精神？看看人们在进行战争并争取胜利时会做出何等美好和出色的事情。看看他们能做出多么巨大的牺牲。看看他们承受了何等的艰辛、危难和困苦，他们又表现出了何等的智谋、英雄气概和优秀品质。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战争。在战时，无论什么样的优秀品质都不为过分。我们在和平时期为什么不能表现出其中的某些优秀品质呢？为什么战争造就出了所有这些辉煌、高贵、勇气和忠诚？为什么和平就只能产生争吵、自私和日常生活的庸庸碌碌？我们在战争中运用的所有艺术和科学现在仍掌握在我们手中，随时都能在和平环境下帮助我们。我们只缺少一样东西——共同的行动准则，一个人人都能理解、并为之奋斗的明确目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年代里，美国成功地经受住了丘吉尔指出的那种道义挑战。冷战促成了激烈的军备竞赛，引发了朝鲜和越南的热战以及从猪湾到阿富汗等几十起较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尽管如此，它却没有把超级大国带入相互敌对的战斗。至少有两次对抗有可能引发全球核大战——肯尼迪任期内的古巴导弹危机和我任期内的赎罪日战争——但苏联最终都偃旗息鼓了。40年来，西方所付出的艰辛、智慧、勇气和英雄行为，按丘吉尔的表述，其目的不是为了赢得战争，而是为了维持和平。将来的某一天，历史学家们将回顾共产主义在冷战中的失败，并确切地理解它的含义：自由的人民在整个文明史上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之一。

我们已不再面对一个强大敌人的侵略威胁。核毁灭的恐惧明显消退了。当前，没有一个国家强大到足以威胁我们、我们的盟国和朋友，而又不冒我们的军事力量作出毁灭性反击的危险。西方政治和经济自由的理想大获全胜的道路已经铺开。但是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前苏联地区和东欧国家，这些理想仍在经受考验。决不能肯定地说它们将占上风。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曾经写道：“最大的历史教训之一就是没有一种文明被视为当然。它的获胜决不是确定无疑的。如果你出了很糟的牌、犯了足够多的错误，角落中的黑暗年代便总是在等着你。”在那些被不按节气的耕耘者荒弃的土地上，自由的理想能否生存下来并兴旺发展，取决于美国——和平与自由力量的光辉榜样——如何引路。而美国能否正确地引导道路，取决于我们对冷战中4条重要原则的理解程度。这些原则要求我们认识到我们自身榜样的巨大力量。它们要求我们行动起来，重新发扬那些曾使我们变得强大的品质。它们还要求我们不要抛弃前共产主义国家正急切加以吸收的这些原则。

只要记住这4条原则，我们就能够打出好牌。

唯有自由市场经济才能充分发挥人类的创造力，推动进步的车轮。冷战告诉我们，共产主义运转不灵，社会主义运转不灵，国有经济运转不灵。共产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使其人民失望，但它的最终毁灭是因为经济上的失败。与食品、住房和服装匮乏相比，人民在缺少政治自由时忍耐力要大得多。

当我在1959年与赫鲁晓夫会晤时，他预言我的孩子们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我回答说：“赫鲁晓夫先生，你的孙子女们将在自由中生活。”当时，我确信他错了。但我却不敢肯定我是对的。那年我在莫斯科参观一家露天市场时，看到人们热情奔放、乐观、对赫鲁晓夫改革的前景充满信心。他们没有政治自由，但赫鲁晓夫至少比斯大林好些，他们大多相信赫鲁晓夫的断言，认为他们将在经济上超过美国。

1991年是戈尔巴乔夫担任总统、苏联共产主义、公开性和改革的最后一个年头，我参观了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家国营商店。人们正在排队，等候购买奶油和几片带软骨的牛肉，他们告诉我，经济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糟。甚至连获取像面包和土豆这样最基本的食品也变得困难了，这在多年来还是第一次。戈尔巴乔夫实施了意义重大的政治改革，但人们却情绪低沉，对未来极度悲观。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是贫乏的。一天早晨天刚亮，我散步穿过红场，在莫斯科大百货商店外面碰上了一条几千人的长队。人们告诉我，谣传说那天上午将出售减价食品。我从他们愤怒而厌倦的脸上看到了他们对现存制度的强烈不满，这种情绪在1959年时是没有的，当时莫斯科自由少些，但比较繁荣。我当时认识到，人民对戈尔巴乔夫已经失去了信心，他改革共产主义的努力可能会失败。这再一次证明，任何一个政治家，无论其是共产党人、非共产党人抑或是中间派人士，都决不应忘记，人民对其领导人的最大期望，就是他们能创造出经济增长和繁荣的环境。

在我们进行“厨房辩论”时，赫鲁晓夫声称，尽管苏联当时在经济生产上落后于美国，但它已开始赶超我们，5年后它将对我们说再见，并促使我们仿效其制度以便迎头赶上。在联合国一次闻名遐迩的会议上，赫鲁晓夫曾用他的鞋子粗鲁地敲击面前的桌子以抗议一位与会者的发言，从而引起举世震惊。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苏联共产主义已成为历史。甚至连现存的共产主义超级大国中国，在经济上也日益资本主义化，尽管在政治上仍是共产主义。这种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主义为非共产主义世界所拒绝。然而，拒绝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胜利。

由于改变计划经济模式和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痛苦，莫斯科和其他地方正大声疾呼要放慢改革步伐。更加令人吃惊的是，甚至在前苏联和东欧已经放弃政府全面控制的情况下，许多美国人似乎仍愿意推动并接受政府在美国人的生活中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当前，政府对我们的干预已经过多了，政府的工作也不尽如人意。它窒息了创造性，耗尽了投资基金，束缚了企业的手脚，这与共产主义的政府一样，只不过后者走得更远一些。资本主义制度并非完美无缺。温斯顿·丘吉尔有一段经常为人们所引用的话：“除了所有其他形式的政府外，民主政府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同样，除了所有其他的经济政策外，自由市场式的资本主义是最糟糕的经济政策。冷战中最重要的教训是，政府的过多干预是进步与繁荣的大敌。

实际上，经济的自由使其具有不可预见性和潜在的不稳定性。但付出这笔代价是值得的。从长远来看，自由市场经济总是要胜过政府下指令的经济。我们必须牢记，美国今天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并不是因为政府为人民所做的事，而是因为人民为他们自己以及人民相互之间所做的事。政府应反映并汲取人民的高尚愿望，鼓励、有时是刺激他们去攀越他们注定要到达的顶峰。然而，自 60 年代以来，政府变成了年耗资 1 万亿美元、极其臃肿的机构，变成了强横霸道的保姆，当我们说了错话或想了错事时惩罚我们，当我们表现良好或被认为特别有价值时以物质刺激和规划奖励我们。

美国必须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领导角色。美国在冷战时期一再证明，它是自由世界中唯一能够坚定地将其力量扩展到边界以外的遥远地区、以遏制苏联侵略的国家。它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粘合剂把欧洲联盟联合在一起，它在亚洲也接受了承担领导责任的同样挑战。为了在中东和波斯湾维护它自己和西方国家的利益，它一次又一次地付诸行动。几百万年轻的美国人无私而勇敢地战斗，去保卫外国的领土。假如我们不愿意在这些事件中投入数十亿美元，不愿意拿我们男女军人的生命去冒险，冷战可能也结束了，但赢家很可能是苏联。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国家或帝国像我们这样可靠而负责任地保卫着它自己及盟国的利益。偶然的错误和判断失

误只能使美国政策的整体连贯性和深刻效果显得更加突出。

45年来，美国以其强大、果断、仁慈和富于创造性撰写了一部怎样作超级大国的著作。由于我们能够容忍对自己的几乎是毫不留情的批评，一些所谓的专家现在要求焚毁这部著作，这是一种很典型的观点。他们认为美国要么回到右倾的传统孤立主义，要么就走向左倾的新孤立主义；他们说美国强有力的国际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是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问题的时候了。他们的论点部分是对的。现在是解决国内问题的时候了——但并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美国才能在一个更高的基点上谈论其国际义务。作为全球最富裕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必须在自身利益允许的情况下，利用一切场合和时机，运用我们的力量去巩固和扩大使我们变得伟大的那些原则和品质。只有那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实现自我。也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够在一个全新意义的目标上找到力量。

除非在国内强大，否则美国在世界上便不可能强大。我对哈里·杜鲁门1949年的国情咨文演讲至今仍记忆犹新。在此前不久，他在与汤姆·杜威的竞选中戏剧性地反败为胜。他昂首阔步地走过议院的走廊，不无得意地品味着他以劣势扭转乾坤的新名声。他演讲的内容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演讲的开头。他说：“国情很好。”一句话博得满场喝彩。今天，没有一位总统能以同样的方式直言不讳地开始其国情咨文。

200年以前，美国军事力量虚弱，经济贫困，但对于其他国家的千百万人民来说，美国是世界的希望，因为我们代表着永恒的价值观念。今天的美国必须成为其他人仿效的有价值的榜样，但我们的榜样已经被诸多日益加深的国内问题所玷污。质量低下的中等教育、猖狂的犯罪和暴力活动、日益扩大的种族裂痕、普遍存在的贫困、泛滥的毒品、娱乐界堕落的色情文化、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观念的日益淡薄、到处蔓延的精神空虚，所有这一切都在